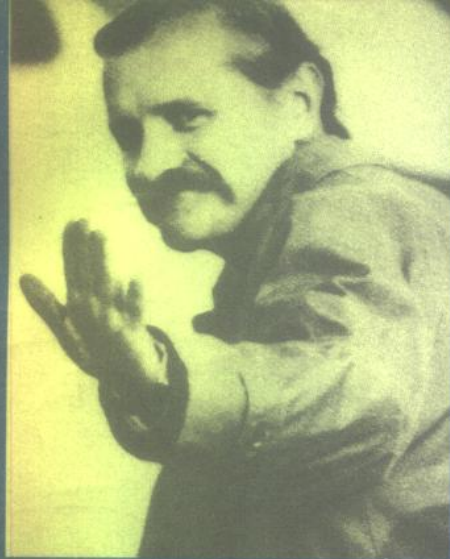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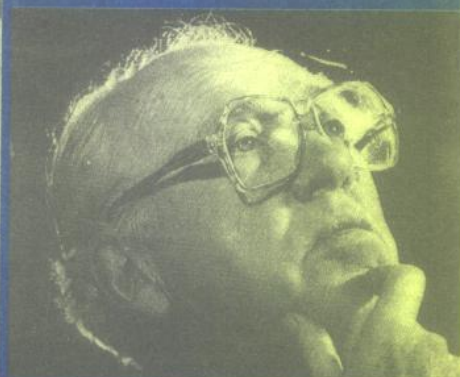




★ ★ ★ ★ ★ ★ ★ ★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董力争 曹殿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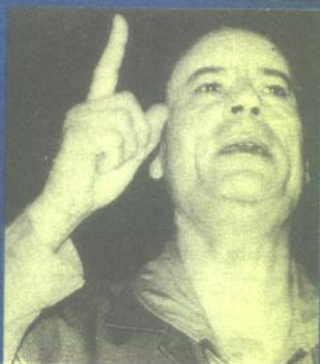


谍海魁首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内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美国最佳畅销书

谍海魁首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内幕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董力争 曹殿波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谍海魁首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内幕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董力争 曹殿波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25 印张 448(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1.40 元

ISBN 7-5043-1907-4/G·707

605749/49

0/

内容提要

本书为1988年美国最佳畅销书。书中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描述了1981年至1987年中央情报局在全球所进行的诸多秘密战争，揭露了“伊朗门事件”、突袭利比亚、中东人质危机、中美洲之战及美国和前苏联间谍战的内幕，突出了“里根主义”在情报界的深刻影响，刻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美国情报界的显赫人物，涉及了许多国家首脑的从政及私生活的内幕，揭示了美国政坛三方鼎立的运作机制，及相互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本书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栩栩如生的间谍战实录，它融纪实文学的准确性和通俗文学的欣赏性为一体，披露了高度机密的高层决策及间谍战内幕。

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擅长撰写政论性文章，1973年曾因揭露“水门事件”而名噪一时。本书是他的又一部力作。

致 读 者

本书中的资料是通过采访有关的 250 多人，直接收集或引用情报资料而来。我多次采访了 100 多人，其中约 15 个重要情报来源受到采访达 6 次以上。我本人很想把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告诉读者，但由于主题的机密性，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是私下的，这意味着我曾经保证不会公开他们的身分。事实上人们不会在没有这种保证下讨论情报及安全问题。许多情报提供人也给我提供机会接触文件、备忘录、记录、索引、其他资料、信件、文件副本及日记等。直接引用的文件都已在书中注明。我发现，与职位适当的提供消息者的讨论一般比阅读成摞的文件更有启发性。

对“伊朗门事件”的大量调查，包括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最高检查委员会，国会特别联合委员会及独立的顾问劳伦斯·华尔士，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及文件，特别是关于 1985 年—1986 年的。

书中引用的会见或交谈时的对话至少来自参加者之一的书面回忆或当时的记录。当描述某人曾“认为……”或“相信……”时，这种看法或出自本人自述或出自某位情报提供人在与其谈话中直接得知其结论。我已努力尽可能保留主要人物和情报提供人的原话，即使不能直接引用时也尽量用他们惯用的语言，尽我最大的可能来反映他们自己的语言特点及其观点。在那些情报提供人的回忆或文件所述不十分清楚时则不予引用。

肖·奥莱塔在他最近的书中写到：“没有记者能百分之百地再现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件。回忆常欺骗参加者们，特别是当结局变得十分清楚时。一个记者常常通过查对许多情报提供人来消除不

准确因素，但对读者及作家来说，由于新闻的局限性而使他们变得谦卑些还是有用的。”我非常信服这一重要论断。

这部书的写作始于1984年晚些时候。起初我的目标仅包括里根和凯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头四年，但在采访及写作过程中，我仍作为《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兼记者而工作着。不久，通过尼加拉瓜、利比亚及伊朗事件，很清楚此书应包括1985、1986及1987年。由于此书是描写上述方面的首批书之一，我清楚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真谛甚至并未接近它。相应地，这部书更接近于新闻而不是历史，特别是有关“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及大量调查正在进行中。

在书中有许多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事，《邮报》主编和我一直在研究其是否出版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我成了我自己的情报来源，我并不情愿地叙述，尽可能准确地表达所发生的事，此外，我也描述了与威廉·凯西的几次会面。

我努力从三个主要方面说明有关情报的内情：（1）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2）白宫。（3）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

从1983至1989年，我与凯西共进行了四五十次的谈话或实质性讨论。我们在他家中、办公室、飞行场或电话里进行交谈，有时他说话很随便能阐明他的观点，有时他拒绝回答。但总起来说，我得到了他对这部书中所涉及的主要的情报主题的观点。他曾说：“每一个人都说得比应说的要多。”他知道另一些人及他本人都接受这一箴言。他很少愿意公开其姓名或成为我的报纸的一个消息来源，他知道我在收集有关这部描写他的中央情报局的资料，而且他多次规定所提供资料不能登在当日报纸而只能写在书里。在其它许多方面，凯西自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公平地说，如果他活着写自己的事，他决不会这样写。他将与我激烈争执，正如他在世时常做的那样。然而，我肯定他最终会认可书中大部分或全部资料，与我争执的原因，或许是他的防御战术或描述故事的方法。

法，或是出于好奇。因而可以说，本书决不是有关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几年经写作雕饰的版本，因为他本人就是本书的参与者之一。

情报的最主要使用者是白宫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根总统的数十位助手曾帮助过我，但我未与总统直接会面。

1971年，中央情报局的强有力支持者，参议员约翰·斯登尼斯在议院议员席上说：“间谍活动就是要采用间谍手段……你必须下定决心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并尽可能保护它，对将要发生的还要闭上眼睛加以接受。”当20世纪70年代情报丑闻披露后，国会中最瞩目的情报活动监督者可能是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了，它想监视并控制情报活动。根据法律，它与众议院的相应机构是国会监督的保证。在里根任期内，立法对情报的监督遇到障碍并最终失败了，有许多国会特别情报委员会成员及其助手帮我记下了那些往事。

为了保密而产生了相应的词汇，一方面很容易对密级采取崇拜的态度并认为凡冠以“机密”或“高度机密”的文件是极为机密的，必须保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对密级怀疑态度，认为密级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块用来掩盖错误的政策或尴尬境地的遮盖布罢了。在我那些最好的提供情报者的指导下，我试着采取了中间路线。但有关此类题目的书如完全保密就失去了相应的价值，幸好这部书绝非如此。

人 物 表

中央情报局局长

威廉·凯西 1981年1月28日—1987年1月29日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博比·英曼 1981年2月12日—1982年6月10日

(国家安全局局长 1977—1981)

约翰·麦克马洪 1982年6月10日—1986年3月29日

(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 1978—1981)

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

马克斯·哈格尔 1981年5月11日—1981年7月14日

约翰·斯坦因 1981年7月—1984年6月

克莱尔·乔治 1981年6月—

中央情报局总顾问

斯坦利·斯波金 1966年6月30日—1973年2月2日

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们

理查德·海尔姆斯 1966年6月30日—1973年2月2日

詹姆斯·施莱辛格 1973年2月2日—1973年7月2日

威廉·考尔比 1973年9月4日—1976年1月30日

乔治·布什 1976年1月30日—1977年1月20日

(副总统 1981年1月20日—)

斯坦菲尔德·特纳 1977年3月9日—1981年1月20日

美国总统

罗纳德·里根 1981年1月20日—

国家安全助理

理查德·艾伦 1981年1月21日—1982年1月4日

威廉·克拉克 1982年1月4日—1983年10月17日
罗伯特·麦克法兰 1983年10月17日—1985年12月4日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

1985年12月4日—1986年11月25日

弗兰克·卡卢奇 1987年1月2日—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1978—1981)
(国防部副部长 1981—1982)

总统助手

詹姆斯·贝克 白宫办公厅主任
1981年1月21日—1985年2月2日
财政部长 1985年1月3日—
埃德温·米斯 总统顾问
1981年1月21日—1985年2月24日
司法部长 1985年2月25日—
米歇尔·丹佛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
1981年1月21日—1985年5月10日
唐纳德·里甘 白宫办公厅主任
1985年2月4日—1987年1月27日

国务卿

亚历山大·黑格 1981年1月22日—1982年6月25日
乔治·舒尔茨 1982年7月16日—

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托马斯·恩德斯 1981年6月23日—1983年6月27日
安东尼·托尼·莫特利
1983年7月12日—1985年7月3日

伊利沃特·伯拉姆斯 1985年7月17日—

国防部长

凯斯帕·温伯格 1981年1月21日—

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

巴里·戈莱沃特主席 1981 年—1985 年

戴维·杜伦伯格主席 1985 年—1986 年

丹尼尔·莫尼汉副主席 1981 年—1984 年

帕特里克·利伊副主席 1985 年—1986 年

序 幕

清晨七点，闹钟催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将军。今天，1980年12月20日，星期四，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第383天，52名被关押在德黑兰的美国人质导致了吉米·卡特总统竞选连任的失败。特纳将在今天向新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作情报汇报。

由于今年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发现一些伊朗人在华盛顿郊外用高强度步枪进行射击练习，所以在特纳住宅一层24小时均有一名卫兵值班。几周后卫兵撤了，现在显得很安静。

特纳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休的四星海军上将，现在正是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时。特纳是一名罗德斯派学者，是系统分析和海军军事专家。他很善于摆脱日常琐事去思考些较重要的问题。但特纳是个易动感情的人，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他被夹在新旧老板之间，一系列矛盾心理正困扰着他。

首先，他必须决定该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把真正的秘密通达里根。那些压箱底的、有潜在爆炸性和危险性的行动及间谍技术是作为总统应该知道的。对此新闻媒介一无所知，就连苏联间谍也不知晓。在里根尚未指定谁是他可以信任的人之前，特纳必须直接和总统本人联系。特纳不能在政客们面前泄密，他们曾参加了前两次汇报会，预计今天汇报时他们也可能参加。特纳最

后还将向总统讲一项最机密的情报行动，在此行动中有 100 多人都冒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特纳还必须引导总统在间谍及秘密行动的成功机会及危险性之间作出抉择，这是总统必须面对的关键所在。里根已保证要恢复中央情报局的元气。

特纳也想增加自己对里根的了解。他觉得在以往的汇报中，里根表面对他很友好，但最终还是难以接近。在他们会面时，里根总表现出一种精巧和超然的惬意，似乎要用一个笑话，一个好莱坞故事或一条保守派教义去驱走世界上的问题。特纳曾忍受了卡特地狱般的无情的煎熬，而同里根接触越多，他却越怀疑此人的基本思维。他私下里称里根是个“笨蛋”。

特纳不得不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的未来。他想表达出他想继续留任的愿望甚至是渴望。里根及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指责卡特把中央情报局逼入绝境，使它实际上不能进行有效的间谍活动。共和党人也指责特纳作为局长对卡特的人权运动过于负责，说他过分迷恋不招麻烦、相对安全但被动的现代卫星和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形容中央情报局是“衰弱”的。特纳想，如果当选总统允许他举行一次听证会，他将驳斥这种看法。他的中央情报局已实施了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将会得到罗纳德·里根的赞赏。

特纳曾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里根不想使中央情报局政治化，他将看到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人嘲笑他作出的会继续留任的暗示。他在海军时的老朋友，退役舰长现任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部主任的赫伯·海图也认为特纳需要面对现实。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留用你，”海图对他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他们在竞选中就抨击了你。”

但特纳仍很乐观，当然有时这是很难的。就在总统竞选后，他召集了 15 名高级助手在珍珠营举行了管理研究会。珍珠营又称

“农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乡村，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训练学院和基地。他半开玩笑似地，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作了一次秘密假投票。黑板上统计票数犹如一杯冷水浇在脸上：卡特 2 票，里根 13 票。这恰好反映了里根在选举团的胜利：489 票对 44 票。

虽然选举后的那天上午天气特别糟，但可以感觉出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走廊内的欢乐气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会探出窗户欢呼，但许多人把里根的胜利比作巴黎解放日。

淋浴过后，特纳穿好衣服，坐下读几分钟书，他拿起本周的基督教科学派的教义。如果他现在不休息一会，一天里将不会有机会休息了。他倾向于信仰基督教的智能派——即认为思想及灵魂高于一切。

下周日的教义说道：“热情地告诉病人他必须清醒过来，要帮助他非理性现象的困惑中解脱出来……”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教义说道。特纳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或许对这位世界上最大和最复杂的情报机构首脑来说，这有点奇怪，但他可以证实这些教义的力量。30 年代，他父亲在股票市场赔本自杀后，他母亲坚强地活了下来。随后，特纳唯一的兄弟又死于车祸，为了摆脱这些无法解释的悲剧和创痛特纳使自己沉浸于宗教中。他曾用红笔对“痛苦是上帝关心的证据”加了标记。

时间快到了，他站起身意识到自己走神忽略了教义。特纳身高 5 英尺 9.5 英寸，长得很结实。他溜下楼去，像只前冲的公羊直奔早餐。当他走动时，带起的微风轻轻吹动着他那浓密的灰发。他暗蓝色的眼睛、淡淡的微笑及那类似“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人员的举止都说明他只能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

早餐上，他喝着果汁及热水加柠檬。他信仰基督教智能派，所以戒食兴奋剂，也不喝咖啡。他甚至不喜欢咖啡冰淇淋的味道。

桌上的《华盛顿邮报》标题是《据报道凯西即将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抢过报纸看着，他丝毫未听说这种可能。这个威

廉·凯西今年 67 岁，是里根竞选班子主席。特纳感到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倒退，是绝对错误的。理查德·尼克松曾任命他 1968 年的竞选运动组织者约翰·米歇尔任司法部长，难道中央情报局成了今年政治战的战利品吗？

特纳读到：“凯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他认为这毫无联系，就像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老海军上将们指挥现代舰队一样。在特纳看来，战略情报局不过是一个老兵，是个孩子气的老头们的组织。现在中央情报局内仍留有战略情报局的残余人员及观点，这些都给特纳带来很大的麻烦。这些人是行动者，是机构的核心，是兄弟队。在与白宫或国会摊牌时，兄弟队可能要遭殃，就像 70 年代中期调查中央情报局活动时所发生的。但这些老资格者都留了下来，因为还需要他们。每位总统，每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需要勇于献身的干“脏”活的秘密行动者。他们组成了一个不开会的俱乐部，热衷于秘密情报计划，是那种能在报酬也是秘密的环境中旺盛生存的人。他们即是中央情报局的优势也是缺陷。现在显而易见是一位“兄弟”从隐居地出山了。《邮报》说凯西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最后 6 个月负责过向德国后方投放间谍的工作，但那已是 35 年前了。

特纳曾觉得如果自己被替换也将会给予起码的礼遇，会在告知报社前通知他。他以为这条消息可能是个试探舆论反应的行为或纯属误传。在总统竞选前他甚至没听说过凯西。二周前里根在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宣布说凯西将回家从事私人法律业务。

将要离职的前景更使特纳深信是他领导中央情报局走出了 70 年代中期的黑暗、混乱时期——在越南和水门恶梦后的大动荡。国会调查中央情报局深深触及了它的内幕：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给非嫌疑犯服用致幻剂、贮存少量毒药和毒液、偷拆信

件及对反对越战的美国人进行间谍活动等等。他已带领中央情报局走出了莽撞的时代，他反对那种令人着迷的而他认为是被歪曲了的秘密修养。虽然在改革后需向国会情报委员会严格报告其行动甚至于高度机密行动，但他表示中央情报局在国会监督下将继续有效地行动。他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很成功，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特纳相信，一旦他们取得了人们的理解，就会得到里根及美国人民的支持。

大选前一个月，特纳摆脱日常工作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份关于他前四年的述职报告及今后四年的计划，日期为1980年10月17日，并标明：“仅供中央情报局局长阅”。但这份七页的大纲对最高机密还是做了保密。《目的——推翻注解》讲述了将使当选总统和他的班子吃惊的事情。特纳在控制莽撞者和兄弟们的野性上确实遇到过麻烦，但他最终获得了控制权而且许多老手现已离开了中央情报局。但现在有一个较大的问题，中央情报局的神经过于紧张，行动处常表现出明显的胆怯和抵制行动。但行动处是进行间谍活动的部门，是在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站进行间谍活动及当总统命令对他国事务进行秘密干预时实施秘密行动的唯一秘密队伍。

特纳曾多次建议进行新的秘密行动，但行动处均加以回避。有一次，特纳未与白宫商量，自己写给负责行动的局长助理一封短信，用以试探他们的反应。在信中他询问能作些什么才能将妨碍美国利益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伊朗领导人霍梅尼及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赶下台。局长助理的回答是：毫无可能。因为在这几个国家均没有能生存的政治反对派，或者中央情报局对某个运动、某个政党或某位领导人没有足够的了解，无法对其加以支持。而实际上特纳所寻求的方式是给这些国家内的某些小组或个人以秘密的资金或协助。在1976年由福特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已禁止暗杀，卡特再次明令禁止。特纳完全同意这项禁令，但即使

如此，行动者们仍担心特纳会让他们走危险的道路。特纳对他们不愿参与的程度感到吃惊，无论他怎样探讨这一问题，局长助理均毫无反应。他们对严重干预他国事务的前景感到不愉快，尽管那是他们的工作。确实，一些金钱正在输送给伊朗境外的反霍梅尼力量，但那至少在白宫看来，它只是用来惩罚霍梅尼或是为了以可能发生的反对革命的运动建立某种接触。

特纳还向行动处建议搞一个有限度的秘密行动计划，在危地马拉发现和帮助一些中间派政治家，或许甚至可以把一些有希望的危地马拉人列到中央情报局的付酬名单上。危地马拉政治火山四处蔓延。在中美洲这是很典型的，即右派军政府和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游击队互相对峙。在一年中，这个国家已死了几百人。按特纳的观点，在这恰恰是可以对中间派给予秘密政治支持并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好时机。

但局长助理的反应好像是他在上午9时的高级助手会议上邀请了克格勃一样。秘密行动者们辩驳说，秘密行动将会使中央情报局面临超越行政策略的巨大危险，而无论怎么说这种政策至今不完全明朗。假如扶植的这个人不成功，假如此人成为无法控制而毁灭我们的人物，或者假如我们扶植了他而后卡特总统或其他总统想走另一条路，那么这些行动太容易出错了。与会者都强烈反对这项建议，特纳甚至未敢在白宫提出这项建议。国家安全助理齐格纽·布热津斯基几乎肯定会支持某些秘密行动，但卡特宁愿停留在犹豫的回旋之中。事实上卡特总统在其任内摇摆于布热津斯基对世界的强硬观点及塞勒斯·万斯的软弱观点之间。特纳有一次私下称卡特为“和事佬”。

在12月14日，特纳曾将另外一些观点及个人想法写入另一篇备忘录，在《白宫》栏下，他写道：“冲突的根据”。呈送的名单很长，但大部分问题与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有关，他似乎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专为他工作的。一次特纳想插手一项有关军备

控制的情报争端，而布热津斯基却告诉他：“你不是最高法院，也不是国家的第四个权力机关，你应明白你为谁工作。”

布热津斯基喜欢原始情报，像国家安全局窃听外国的通讯——常给他提供某些国家领导人谈话的译本，或某些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发回本国首都的已破译密码的政治分析。“你看了那份窃听报告了吗？”布热津斯基常这样问。特纳感到布热津斯基犯了低级分析人员的典型错误，即认为可以通过一次海底电报或一次窃听所得来解释重大事件。因为国家安全局常截获一些吹牛者，一些得到错误的报告而妄自尊大的官员的话或一位大使报告他并不清楚的东西。特纳在《国家安全局》栏下写道：“单一来源的情报分析是危险的。”

特纳与布热津斯基之间的争斗不断，后者有时掠夺成性。“你在苏联国内一个重要人物也没有”，布热津斯基曾对特纳说过这样的话。布热津斯基一次与特纳在苏联发展了几名俄国重要人物，尽管只有一人他能肯定是忠诚的，其中两人已失踪，也可能被杀——他无法加以肯定。

自1977年始特纳的每周三次向总统汇报情报改为每周一次，其后又改为每两周一次。他将此归咎于布热津斯基。因他曾指出他以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分析比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好。

当1979年10月伊朗国王赴美治病，即德黑兰人质危机发生两周前，白宫要求中央情报局窃听这位已下台的伊朗统治者的病房，从而知道这位易变的、受癌症折磨的人想做什么。特纳反驳说国王与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律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收集情报。但布热津斯基却给他下达了书面命令，特纳只好忍气吞声，下令对国王在纽约市一家医院第18层的三间病房进行电子侦听，尽管他仍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把情报比作工具，就像用铝锤测量一样。当它未起作用，当“窃听器”不能立即就位，或当中央情报局未能